

新编中国史

宋史

文治昌盛 武功弱勢

游彪◎著

中信出版集团



宋史

新编中国史
宋史

文治昌盛 武功弱勢

游彪◎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史：文治昌盛 武功弱勢 / 游彪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086-7120-8

I. ①宋… II. ①游… III. ①中国历史—宋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08529号

著作财产权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财产权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宋史：文治昌盛 武功弱勢

著 者：游彪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20.5 字 数：447千字

版 次：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5000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7120-8

定 价：7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自序

这本断代史的写作，前前后后持续了三年左右，其间甘苦自知。编写大学生使用的教材，笔者首先要考虑的有几个问题：一是不能如学术著作一样过于专业，以免学生难以理解，因而要尽可能地以平实的语言进行客观描述。二是必须尝试一些新思维，以前出版过几部宋朝的断代史，内容大同小异，其最大的优点在于知识的系统性，基本上是将重点放在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层面。本书试图突破这种结构的束缚，除了用少数章节叙述宋朝的制度以外，更多地侧重于宋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在公权力方面，则是关注以皇帝为首的朝廷的统治“术”等。这些都是不同于以往的，或许上述思路尚不成熟，但毕竟呈现了某种新模式供人参考。三是切忌面面俱到，而是凸显某些“点”，以免流于对两宋历史的浮光掠影。为达成这一目的，本书主要是通过外围的分进合击，力争将以前为人所忽略的史实写得更清楚、更透彻一些。其

中城市化进程问题，笔者并无把握，于是邀请云南大学吴晓亮教授代为执笔。之所以做如此处理，实际上是为了使本书具有适当的深度和广度，避免过于浅显。四是要尽可能吸取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反映迄今为止宋代史研究的新进展。

诚然，以笔者的学识和能力，几乎无望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但朝着这些方向努力则是完全有必要的。至于最终的结果如何，还需要等待读者的评判。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出版社编辑部的大力协助，在此，对出版社的编辑诸君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对研究生石俊英、孙健、侯贝贝、刘雅萍为本书付出的艰辛劳动也一并致谢。

2008年10月8日于北京师范大学茹退居

前 言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以为，两宋已无汉唐雄风，是中国古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期，因而将宋朝视为一个腐败无能的王朝。尤其是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宋朝一直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在与西夏、辽朝的战斗中，宋军几乎多以失败告终。更为严重的是，北宋末期，宋徽宗、宋钦宗两代皇帝被女真族所俘，客死异域；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失去了北中国的大片土地，最后为蒙古铁骑所灭。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宋朝历史的认知存在很大的误解，这是需要加以澄清的。

一、欧美学者之宋代观

欧洲研究宋代历史的先驱、法国汉学家埃狄纳·巴拉兹（Étienne Balázs）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在宋代已经完全发育成熟，

近代中国以前的诸多新因素已经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依据上述认识，巴拉兹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制定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宋史研究计划，其目的是要研究宋代为什么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尽管巴拉兹的计划在其生前并未完成，但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宋史研究机构在欧美各国陆续成立，进而形成了一些国际性的学术组织。此后一些美国学者对宋代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如斯坦福大学教授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认为，在11世纪的中国开封，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不少日本学者也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其中以汉学大师内藤湖南为代表。他认为宋代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¹，大体上相当于欧洲的十六七世纪。尽管上述看法遇到较为严重的挑战，尤其是中国学者的批评（至今中国学者尚未认同，还是按照传统观点将宋代视为古代社会的一个阶段，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明朝中叶以后才出现的），但这些论点后来逐渐为很多欧美学者所接受。

二、结束割据，实现统一

自755年爆发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权逐渐衰落，各地节度使依靠武力割据一方，“大者称帝，小者称王”²。在这种分裂状态下，各地军阀依靠掌握的武装力量相互吞并，改朝换代，擅自募兵征税，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宋朝建立后，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的不懈努力，基本上统一了中国。此后，宋朝历代皇帝采取了很多较为行之有效的措施消除藩镇割据，维

护了国家的统一局面，从而为整个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另一方面，尽管两宋时期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少数民族政权势力异常强大，双方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但宋朝在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还是占着主导地位。汉族的先进文明和生产技术等不断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当时的两广地区等，边疆地区因此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开发，从而极大地促进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繁荣，这也是巩固统一国家的重要前提。

三、经济的高度发展

总体而言，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其文明程度居于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这是中外学者都认可的事实。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对南宋时期的中国社会做过这样的评价：“十三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叶和盐业企业，其对于外贸（丝织品和瓷器）的倚重，以及其各地区产品的专门化等。……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³从中不难发现，宋代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在世界文明史中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具体而言，宋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商业等，都取得了长足而巨大的进步。就农业领域来说，宋代

全国总人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突破一亿，大体上是汉唐盛世的两倍，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一方面表明劳动力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足以养活数量众多的人口。在以农业为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时期，人口的增加是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指标之一。宋代耕地面积大约有七百万顷，大体上也是汉唐时期的两倍，且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大大提高。在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通常一亩到一亩半的土地即可以养活一个人，而战国时期大体上需要六亩土地才能养活一个人，这表明宋代农业生产力的大大提高。

在粮食产量提高的同时，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迅速展开，农业多种经营蓬勃发展，这是宋代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棉花种植逐渐从海南岛、福建、两广地区向北传播，茶叶的栽培则遍及大半个中国。当时种茶的农户被称为园户，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将种茶当作职业，基本上不种植粮食，因而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茶农。这既有利于茶叶生产规模的扩大，也有利于产茶技术的改进与创新，更有利于茶叶质量的提高。宋代这样的专业户包括社会生产的众多领域，如果树栽培户、桑蚕户、花农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宋代社会分工的深入，也为丰富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提供了条件。

在手工业领域也同样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发展，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大大超越了前代。宋代手工业大体可以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形式。官营手工业是指政府控制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场院等，其产品小部分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大部分都供官府使用，如兵器生产等。私营手工业形式多样：一种是农户的家庭手工业，这是作为农民的副业而存在的。除了生产自己需要的产品以外，也有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农民以此增加收入。另一种是乡

村地主经营的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大小不等，主要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生产，但经营乡村手工作坊的地主并没有完全脱离土地，因而他们既是地主，又是工场主。还有一种便是专业的手工业作坊，这些作坊主要集中在城市，它们的所有产品都是商品，从业者完全依靠出售产品来维持生计。

宋代手工业技术及工艺相当先进，就拿冶铁业来说，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根据宋代兵器制作、铁钱铸造和农具制造等方面的消耗情况，推算出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的铁产量大致在七万五千吨至十五万吨。这一产量是 1640 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二点五至五倍。到 18 世纪，欧洲各国（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的铁产量大致在十四万至十八万吨之间，因此宋代中国的铁产量基本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⁴再如煤炭开采，宋代的煤产量无疑是居当时世界第一的，而且开采技术非常先进。1954 年，河南鹤壁发掘了北宋晚期煤矿遗址，矿工根据地下煤层的情况，将煤田分成若干小块，采取“跳格式”方法，先内后外，逐步将煤炭开采出来。而且，井下巷道布局合理，照明、通风、排水、支架等设施完备。在宋代以后数百年，欧洲煤矿井下还不敢点灯，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挖掘。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宋代手工业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活动也空前活跃起来。宋代的商业发展首先表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数量的大量增加。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居住区内禁止经商。宋代逐渐打破了坊市格局，允许商人经商，街道上随处可以开设店铺。尤其是北宋都城开封（今河南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今

浙江杭州)，城市人口都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大都市。其商业更是异常发达，据一些学者统计，北宋都城开封已经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八千至九千家小商小贩。在城市周围和乡村的交通要道所在之地逐渐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市，这种集市在岭南被称为“墟市”，在北方被称为“草市”。这些集市又被总称为“坊场”，它们遍布全国各地，形成星罗棋布的商品交换网络。这些都表明，宋代商业活动空前活跃。

与此同时，宋代的海外贸易也是空前繁荣，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等资料记载，与宋朝保持通商贸易的国家达到六十多个，宋代海外贸易范围较前代大为扩展。当时中国的商船不仅坚实耐用，而且船体庞大。更重要的是，出海的商人掌握了当时全世界最为先进的航海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南针的应用，使海外贸易得到了巨大发展。随着商业贸易规模的扩大，货币需求量猛增，官府铸造的金属货币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因此北宋前期四川成都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至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式由政府出面设立交子务。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地区使用这种异常方便的货币。西方最早的纸币是1661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但这家银行很快就倒闭了。至1694年，英格兰银行开始正式使用纸币，比中国晚了七百年左右。

四、文化的昌盛

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宋朝政府实行了相对开明的文化政策，

加之刊刻、印刷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统和创新的文化不仅能够保存下来，而且还能够广泛传播，更重要的是，它使教育得以普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代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已故著名史家陈寅恪曾经对宋代文化做过这样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⁵在他看来，中国文化至宋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习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以外，其他各种学问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论，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举例来说，两宋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形成了不少自成体系而又颇具功力的学术流派，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如周敦颐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关于宇宙本原、

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的理论体系，成为宋学的开创者，在建立新儒学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至北宋中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认为“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原；它不仅是自然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宋学的奠基者。

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糅合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敦颐、张载等人的学说，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他种种不同的思潮。与朱熹学说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朱陆二人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

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纪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在宋代，不仅政府出资出力编纂当代历史，同时也允许私人撰写本朝历史，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政府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应该说，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如宋词、绘画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藏，也给后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话本等。

五、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

宋代科学技术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是北宋时期发明应用的。隋唐以来，中国便已经出现了雕版印刷，至宋仁宗庆历年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技术，也是世界印刷历史上一项最为重要的发明，现代铅印的印刷术就是在毕昇陶活字的基础上改进的，这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火药也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最初是由道家炼丹而发明。到宋代，由于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和战争的需要，火药开始应用于军事，如北宋时期的火箭、火球、火炮等。至南宋时期，火药武器技术越发先进，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曾经使用火枪冲锋。至南宋中晚期，又出现了突火枪，这是后来步枪和子弹的雏形。火药经过阿拉伯商人传到西亚、南亚各国，至13世纪末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欧洲人会制造火药武器则已经是14世纪以后的事情，比中国至少晚了四百年。

指南针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但当时人们只会使用天然的磁石，因而指南的灵敏度不够准确。到北宋时期，人们开始用人造的磁铁片做成指南鱼，可以浮在水中自由转动，鱼头就会灵敏地

指向南方。后来，大科学家沈括又对指南针的制作进行了很大的改进，经过多方面的试验之后，沈括制造出了非常完善的指南针。同时，他还在试验中发现了磁偏角现象，这是对地磁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一发现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所发现的磁偏角要早四百年。这些发明不仅对中国历史，而且对人类社会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数学和天文学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天文学理论方面，北宋哲宗绍圣初年，宰相苏颂完成《新仪象法要》一书，分别介绍了浑仪、浑象、水运仪象台的设计，这部书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它代表了当时天文学领域的新成就，也反映了宋代机械制造的水平。正因为天文观测相对准确，宋代的历法相当精确。北宋中期，平民出身的卫朴修订历法，以 365.243585 日为一年，尽管比实际数字稍大一些，但比此前的历法要准确。至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 365.2425 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 1582 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二十六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府出面编辑刻印了很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其中《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收录中药处方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四个；《圣济录》二百卷，是中医学史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收集了诊断、处方、审脉、用药、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一千五百五十八种，其中新增加六百二十八种新药材，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

学著作。对前代医学的总结和医学书籍的流传，是宋代医学进步的重要原因。宋代医学极其重要的成就之一便是医学分科更加细密，宋朝初年，仍然按照前代分为内科（古时为方脉科）、针科、疡科（外科）。至北宋中期，官办的太医局新增设眼科、口齿兼咽喉科、针灸科等，共分为九科，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妇科、小儿科等医科独立发展起来。

在医学的分支法医学领域，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上述仅仅介绍了宋代医学领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窥两宋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一斑了。

总之，确如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所言：“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⁶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目 录

自 序	v
前 言	vii
第一章 两宋政局之演进	1
第一节 北宋政局的走向	2
第二节 南宋政局的脉络	9
第二章 祖宗家法与传统国策	17
第一节 齐家之道	18
第二节 治国之策	34
第三章 北宋的社会变革运动	49
第一节 昙花一现的庆历新政	50
第二节 熙丰变法	56
第四章 宋代的政治制度	77
第一节 中央行政体制	77
第二节 地方行政体制	94
第三节 监察制度	105
第四节 军事制度	114